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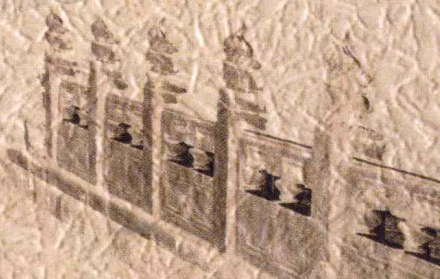
晚清二十年

一个末路王朝的
孤独背影

一个民族在变革时代
的艰难选择

马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晚清二十年

马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二十年/马勇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375-6

I. ①晚… II. ①马…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清后时代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2343号

责任编辑 杨 华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51千字

开 本 710×1010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页2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375-6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大转折	11
东邻日本转身向西	11
群雄逐鹿东北亚	17
日本不宣而战	28
终于知道什么是兵败如山倒	41
以战促降与乞和议和	48
第二章 维新时代	65
四万万人齐落泪	65
维新运动发生	69
京沪强学会	74
南梁北严	81
湖南区域试验	87
官场上的迟到者	91
失控的改革	98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105
一场未遂政变	113
第三章 尴尬记忆	123
大阿哥引爆政治动荡	123

“运动”义和团	130
冲突在犹豫徘徊中持续升级	138
走向对抗	148
一场奇怪战争	154
又是乞和与议和	162
 第四章 重新起步	170
而今迈步从头越	170
构架现代新教育	179
现代军事体制的重建	184
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	187
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189
改革又到困难时	193
 第五章 短暂徘徊	196
一个人的革命	196
奇怪的战争与费解的中立	199
震动与启示	204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208
又是一个成功典范	211
 第六章 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215
上下联手	215
临门一脚	219
五大臣出洋	224
总算有了一个开始	228
 第七章 让理想变成现实	234
改定中央官制	234
重建地方官制	238

革命促改良,促立宪	242
政治改革突然提速	247
一个美好的期待	251
 第八章 向立宪政治艰难行进	259
一个偶发事件	259
王朝的终结者	266
制造敌人	271
新时代新希望	278
 第九章 民主政治短暂的春天	283
谘议局:民主初步与有序参与	283
有计划的政治:立宪日程表	289
皇族内阁≠责任内阁	295
铁路干线国有:国进民退引爆革命	302
 第十章 一个王朝的终结	310
又到剿抚犹豫徘徊时	310
独立与光复:墙倒众人推	313
走向共和	321
清帝逊位:最后的潇洒	326
 后 记	336

引子

如果从1861年发动“祺祥政变”开始算起,慈禧太后在大清王朝最高领导人这个位置上已经呆了二十五年了,尽管这个位置只是垂帘听政,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最高领导人。然而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不论她对权力是怎样的充满兴趣,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都会消磨掉这单调乏味的权力欲望。更何况,过去的二十五年,慈禧太后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准确地说,应该变化的都变了,——向西方学习,踏上近代化的轨道,中国的发展大致上说来已经进入正轨;而不应该变化的都没变——大清王朝还是满洲贵族统治,不管汉人官僚拥有怎样的权力,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动摇。一个时代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下来了,这个时代不管谁是名义上的皇帝,谁又能不承认这个时代其实就是“慈禧太后时代”呢?一个年过半百的寡妇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1886年7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满打满算年过半百的慈禧太后似乎失去了对权力的兴致,她在这一天与年仅十五岁的儿皇帝光绪帝一起召见满洲贵族重臣醇亲王奕譞暨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商量她不再垂帘听政,而由光绪帝亲政直接处理国家政务的事情。懿旨指出,当年小皇帝即位时只有三岁,实在太小,无法亲政,大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所以当年不得已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郑重约定一旦小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①十二年过去了,小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长大成人了,最近也能够亲自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这当然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所以慈禧太后有意借此机会卸任息肩,颐养天年。因此太后郑重且高兴地宣布,她将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遵守当年约定择期归政,请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1887)某个时刻举行皇帝亲政典礼。

如果我们不带有“恶的历史观”去延续一百年来的“革命话语”,如果我们从日常情理的层面去体察慈禧太后此时此地的心情,我们应该相信太后的真诚,应该相信她的“退位”并不存在着什么微言大义,而是其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清国的鼎盛时代,接近于三十年的洋务新政给大清国带来了一番新的气象,先前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大致得到恢复,大清王朝似乎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盛世时期。慈禧太后在这个时候提出由小皇帝亲政,其实就是功成身退,就是要在青史上留名,要用事实正告那些一直诋毁她政治人格的反对派:太后并不是权力的贪婪者。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刻意要替慈禧太后翻什么案,因为历史事实俱在,因为在那时大清王朝内部并没有谁对太后的权力提出过挑战,担负执政政治责任的满洲贵族集团对太后过去若干年的工作大致还是满意的,所以也没有人

对太后的权威提出异议。

从太后的立场进行分析,她之所以提出让小皇帝亲政,主要的还是为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考虑,希望小皇帝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能力,树立威望,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或团队。然而,从小皇帝的立场看,不论真的要长到了多少知识,十五岁就担负起大清王朝的政治责任,委实有点太累太恐惧,何况这个位置迟早都是自己的,有老佛爷在前面罩着,帝国的一切用人行政,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所以当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小皇帝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亦奏——时事多艰,万几繁钜,小皇帝在皇太后的指点



慈禧太后

下,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精进不止,不断进步,是有了相当的能力。不过学无止境,如果皇太后能够从缓归政,将小皇帝扶上马再送一程,将来皇上躬亲庶务,必能贯彻无疑,益臻上理,有助于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实为大清王朝之福、天下臣民之幸。

醇亲王奕譞是道光帝第七子,他的大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他们的第二子载湉也就是现在的光绪帝。从亲情上说,醇亲王奕譞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是当今皇上光绪帝的亲爹,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说,他的陈情与呼吁,都是真诚的,都是为帝国,为小皇帝未来前途好。何况,醇亲王奕譞的学识才智不过中等,既无野心,更无锋芒,他之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比较公平的说法就是他的平庸和谨慎。

至于礼亲王世铎,他虽然长时期位居军机处领办大臣等显赫地位,但实在说来大概也属于那种比较平庸甚至比较无能的人,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似乎不必怀疑,所以在慈禧太后当政的那些年,礼亲王世铎的政治待遇一直保持不变,以满洲贵族掌门人的身份协助皇太后处理朝政。

醇亲王、礼亲王的再三吁恳,情词亦出于至诚,皇太后对此也有比较深的了解,但她主意已定,并不理会光绪帝及醇亲王、礼亲王等人的恳请。慈禧太后向他们解释说:十二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皇帝继统御极,仰承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时艰,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初七日懿旨的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皇上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皇太后的决定不再改变,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命各相关衙门敬谨查明成案与惯例,奏明办理。

这是慈禧太后宣布归政当天的事情,所有细节在《清实录》、《翁同龢日记》等相关文献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的研究者对事实本身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看法,只是在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动机分析上,大都遵循“恶的历史观”来揣测慈禧太后归政的诚意并不可靠,认为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使她不可能真的放弃已经获得的至上权力。这种分析其实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是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书生之见或臆想。

根据翁同龢在日记中的记载,醇亲王奕譞在向慈禧太后当面请求从缓归政

未准后,曾找帝师翁同龢等人商量对策及善后,醇亲王介绍了与皇太后面谈的情况,说皇上亦当面跪求,但仍然没有使太后回心转意。翁同龢说:这个事情至关重要,王爷宜率御前大臣、毓庆宫诸臣一起请起面论。醇亲王对于翁同龢的建议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表示待军机处开会商量后再作讨论。

在稍后召开的军机处会议上,礼亲王世铎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圣意难回,只好承旨去做。翁同龢对此似乎还是不死心,他依然建议醇亲王率枢臣继续面谏,争取慈禧太后收回成命。醇亲王表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待第二天王公大臣会议会商后,再作表示。

散会后,翁同龢往访问僚孙毓汶,告诉他如果请求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不如请缓归政为得体,而孙毓汶对翁同龢的建议唯唯否否,不知所云。是日夜,热情亢奋的翁同龢起草了一份奏折,准备明天商之同人。

第二天(7月12日,六月十一日),一切如常,翁同龢将他起草的奏折底稿交给同僚进行讨论,大家大致同意翁同龢的建议,遂定议连衔上,并以此请示醇亲王奕譞,奕譞以为然。当天各方面的酝酿基本成熟,但能否如愿还要看慈禧太后本人的意思。

7月15日(六月十四日),醇亲王奕譞先上了一个折子,折子的前半段吁请皇太后体念时艰,继续训政,即便要归政,也应该等皇上二十岁时;后半段则专言皇帝亲政后宫廷一切事仍请太后裁决,上不问,始可专心典学云云。醇亲王的这个折子似乎已经考虑接受皇帝亲政的意思,所以翁同龢对这个折子的评价似乎不高,以为“意甚远”。^①

同一天,礼亲王世铎等重臣也奏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在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的蒙古亲王伯彦讷谟祜等也专折奏请皇太后从缓归政。这些呼吁请求,可以说是帝国政治游戏,是政治粉饰,是对皇太后的拥戴。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在这些呼吁请求后改变主意,她表示:垂帘听政之举,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这个决定经过反复审慎权衡,是最后决定,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赜。皇帝亲政之始,容或有未及周知的事情,但只要各位重臣共矢公忠,尽心辅助,内而枢臣,外而疆吏,均是朝廷的重要凭借,协助皇上处理政务,责无旁贷。

^① 《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0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各位只要殚竭血诚,力图振作,于应办事宜任劳任怨,不要因循推诿,致负委任。至于皇帝求学,本无止境,一切经史之功,国际事务,仍由毓庆宫行走诸臣朝夕讲求,不惮烦劳,俾臻至善。总之,帝德王道,互为表里,皇帝亲政后,正可将平日所学付诸实践,以回应天下臣民对皇上的期待。慈禧太后坚决否定了醇亲王奕譞等人要求其继续训政数年暂缓归政的建议,表示这个事情不必再作讨论。

对于醇亲王奕譞在奏折中提出的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希望皇太后在归政后参照现在规制,凡宫中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以便皇帝能够专心于大政的建议,慈禧太后表示可以考虑,称皇帝很小的时候就接到宫中由她亲自抚养教育,十余年如一日,感情至深。所以即便皇帝亲政后,她也不会将所有事务全部推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经验随时调护,随时提醒。皇太后表示这是她的政治责任,不容推卸不容否认。平心而论,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放在任何一个母亲那里都是可以理解的正确决定,不必赋予历史文献本身所没有的涵义。

这一天,钦天监的选择光绪帝亲政吉期的报告也提交上来了,亲政典礼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也就是1887年2月7日举行。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两人关系很深,感情也好。如今皇上要亲政了,翁同龢也觉得自己的努力奋斗特别是多年心血就要有结果了。7月16日,他在给皇上例行上课时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感动。这一天,翁同龢还与各位王公大臣商量再上奏折,希望即便皇太后归政、皇上亲政了,海防及一切紧要事情仍应由慈禧太后做最后决定,并准许臣工封事直达储秀宫,像过去一样可以直接请示汇报。诸王以为然,但怎样建构这个新体制,诸位王公大臣以为还要与礼部商酌决定。

慈禧太后归政大概是没有办法转圜了,军机处和各位王公大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劝说皇太后放慢归政的步骤,或者答应在归政后仍然为帝国重大事务操劳。17日(十六日),军机处拟就一份奏折,首言垂帘听政虽权,仍是守经;次颂过去二十年,皇太后在大清王朝政治发展中的功德;末言外国交涉事,战守机宜,未来还是要仰承慈禧太后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文中甚至有“为亘古未有之创局,即系亘古未有之盛事”二语,被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嘲讽,以为不甚妥当。

翁同龢不仅忙着与诸位王公大臣商量着怎样请求皇太后暂缓归政,而且利用他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当面劝说光绪帝一定要在皇太后面前诚恳请求,真诚希望皇太后能对大清王朝继续负责。翁同龢等人的用意究竟有多少发自内心真

诚,有多少是官场规则和礼仪,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在光绪帝、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以及各位王公大臣一再呼吁奏请下,慈禧太后于7月19日(六月十八日)不得已答应勉为其难,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真的是扶上马再送一程。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早些天因为皇帝典学有成,特降懿旨,及时归政。这是深宫十余年来殷殷盼望之善衷,天下臣民自应共谅。所以当这个决定宣布后,王公大臣等合词吁陈,均未允准。只是最近几天,皇帝及各位王公大臣再四恳请,情真意切,力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提出了不少应对方案,读后令人深省。所以当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俟数年后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慈禧太后原本功成身退,为她的时代画上一个完美句号,可最终因为这些原因没有成功。

在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收回成命,答应在光绪帝亲政后再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非常大的变数,至少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中心发生了偏移,使许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

不过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慈禧太后和清廷最高政治层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预感,皇太后在决定接受群臣呼吁收回成命时,就命令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专门研究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以免发生权力冲突贻误大事。

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根据内阁等衙门提供的相关文献和规则,于1886年11月21日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建议方案,规定在皇帝亲政后所有谒陵、祭祀等大典,均循旧制由皇帝亲自出席,或循旧制由礼部提出具体方案;凡遇皇帝召见、引见事宜,建议参照礼臣会议规制,暂设纱屏为障,皇太后在幃后升座训政;凡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的奏折,均按照现在通行的规制书写;凡需接见的各部臣工,仍按旧制一律带领引见,至于皇太后是否出面接见,由皇太后届时自行决定;至于乡会试等各项国家大考,仍建议循旧制由相关部门拟题,呈皇太后审定,由皇上宣布,录取结果也仍由皇太后把关;内外臣工所递奏折需要批示、批复的,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由皇太后审定后发下。

按照这个制度安排,光绪帝亲政后似乎还有一个政务处理见习期。在这个

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亲自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在这个见习期也就是继续训政期仍由皇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越来越多。这大概就是皇太后和满洲贵族重臣的期望,希望十五岁的小皇帝在老太后的带领下在政治上逐步成熟,或许能够像醇亲王奕譞所期待的那样,再过五年时间,待光绪帝二十岁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政务。到那时,为帝国操劳三十年的慈禧太后再从第一线退出。这样肯定更有利于帝国的稳定。

从大清王朝的政治立场看,这个制度安排可能更合乎逻辑和道理,更合乎大清王朝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当时并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筹备着、进行着。

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一大早,年仅十六岁的小皇帝一脸肃穆,亲往大高殿拈香,寿皇殿行礼,然后率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六部九卿满汉高官前往慈禧太后居住的正宫慈宁宫门外行庆贺礼。礼毕,御太和殿,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朝贺。礼成,光绪帝颁布亲政后的第一份诏书,一是感谢过去十几年来慈禧太后的辛勤养育,感谢皇太后过去十几年的孜孜不倦,励精图治;颂扬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的精心治理下纲举目张,物阜民康,丰功伟绩,为向来史册所无。

光绪帝的亲政诏书在谈到未来体制时,强调尽管自己遵照皇太后懿旨亲政了,但未来几年帝国的重大决策依然如过去一样,由皇太后作最后决定,负最后责任,皇太后仍是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光绪帝要求诸王贝勒内外大小文武群臣,务当各抒忠赤,尽力报国;全国军民,敦本务实,共享升平。

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从理论上说并没有使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只是毫无疑问地是,随着小皇帝亲政,随着小皇帝的成长,帝国政治的最终决策权必将逐步向光绪帝移交,这是朝廷内外大小臣工都看得很清楚的。所以,随着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尽管继续为帝国政治负最后责任,如果不发生意外,她相信一个时代必将终结,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所以,她要主动让位,她要为自己的余下岁月寻找生活兴趣,甚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居所,一来方便自己生活起居,二来逐步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让光绪帝逐步独立自主地处理帝国政务。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光绪帝亲政后不久,两宫似乎就在进行这方面的

安排,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1888年3月13日(光绪十四年二月一日),光绪帝就此谕内阁,宣布将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加以整修,并更名为颐和园,以备皇太后将来归政后居住。上谕说,过去二十余年,我圣母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对自己实在考虑太少,现在想来实在有点不太合适,因念西苑距皇宫也不是很远,往年乾隆皇帝曾经在这里驻蹕,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神。园中万寿山前的大报恩延寿寺是乾隆帝为庆祝其母六十大寿修建的。现在整理后由皇太后使用,敬踵前规,也是一个吉祥的去处,只是旧名清漪园谨改名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更是作为慈禧太后六十华诞的贺礼。

对于光绪帝的孝心,慈禧太后当然高兴,但她也明确指示现在虽然寰宇粗安,也不敢稍有暇逸之心,还是应该一切从简,只要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她的心也就安了。

慈禧太后是对大清王朝有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按理说重建一个住所也是正当之举,然而我们看到大清王朝的体制在这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在言官以及一般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光绪帝明确宣布此项工程并不动用国库中的经费,“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羨余,未动司农正款”^①,这也是这项工程后来备受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颐和园的整修工程是与光绪帝亲政、大婚,以及慈禧太后完全归政联系起来的,环环相扣。也就是说,之所以要整修颐和园,是因为皇帝真的长大了,成人了,要结婚了,要完全主持帝国政务了,为了帝国权力中心的一元化和唯一性,慈禧太后确实准备迁出皇宫了。1888年7月27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定于明年二月归政。稍后,懿旨择定具体日期为二月初三日。至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在稍后发布的懿旨中择定为明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说,当光绪帝完成大婚典礼成人仪式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慈禧太后也就将帝国的所有政务统统交给光绪帝。

慈禧太后这一次应该是真的下定决心退出政坛,徜徉于山水之间,颐养天年了。慈禧太后这个决定究竟有多少诚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怀疑,其实这些怀疑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事实是,随着完全归政日子的逐渐来临,朝廷内部似乎也有不同声音。1889年2月20日(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御史屠仁守向朝廷递

^① 《清实录》第55册,第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交了一份奏折,大意是建议慈禧太后在这次完全归政后,继续操控或者说实际上掌握政权,建议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按照训政时期的体制仍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皇太后披览后再施行,并建议皇太后不要住到颐和园,远离皇宫,继续住在慈宁宫,以方便对朝政的干预。

屠仁守的建议或许是出于挚诚,出于对帝国未来的关爱,但是这个建议却惹恼了慈禧太后,太后看了奏折后极端震惊和愤怒,表示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鉴于前代流弊和教训,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这是不容再作讨论的事情。现在如果按照屠仁守的建议,归政伊始,又降懿旨,饬令内外奏折仍书皇太后圣鉴,仍由皇太后指示,这不是让皇太后自坏规矩,自损名声吗?屠仁守的这个建议既与朝廷先前的决策相违背,又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紊乱成法者戒。屠仁守为此丢掉了御史职务,并被宣布永不叙用,只好回老家教书去了。看来,慈禧太后的归政决心并不必怀疑。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从此完全从政治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太后归政后仍然有办法继续为帝国政治出力,为光绪帝把关,而通关渠道不再是训政时期的权力二元,即所有奏折一式两份,分送皇太后和皇上,而是权力一元,由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惟需要皇太后操心者,由皇上的生父,也就是醇亲王奕譞随时与皇太后单线直接联系,听取皇太后的意见。只是这个联系,并不是帝国体制中的硬性规定,更不会使训政体制继续下去。

慈禧太后希望完全归政的决心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其诚意也是不必怀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究竟是利是弊,也都很难说。清末掌故《异辞录》在谈到这个事情就说,假如慈禧太后当时接受了屠仁守的建议,继续训政时期的一些做法,那么后来的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肯定都会不一样,慈禧太后也可以避免第三次垂帘听政的尴尬,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都之惨,乃至《辛丑条约》规定的数十年期限,本息加在一起多达九万万两的战争赔款。

历史当然无法假设,历史就这样走过了。1889年2月26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十八岁的光绪帝大婚礼成。几天后,3月4日(二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宫中继续住了一个半月,就在光绪帝的陪同下前往颐和园。一个属于慈禧太后的完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属于光绪皇帝的新

时代就此正式揭幕。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慈禧太后和中国农村中千千万万的老太太没有什么区别,她们养育了儿子,然后培养他成才,然后为他娶妻成家,然后就把这个家交给儿子和儿媳。比较理智理性的婆婆此后一般都不愿过多干预孩子的生活。从日常情理的视角就不难理解慈禧太后的选择和放心离开,就不会产生那些无端的猜疑和臆想。

当然,人们还想问的是:慈禧太后的时代真的就此终结了吗?后来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这个终结是不可靠的吗?

是的,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内容。

第一章 大转折

1889年3月4日,也就是光绪十五年二月三日,十八岁的少年天子光绪帝在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满汉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声中驾御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宣布大清帝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将在过去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大清王朝一定能够再现昔日辉煌,告慰列祖列宗。年轻的小皇帝踌躇满志,然而他不知道过去的三十年单纯发展经济很容易,吃穿住行等物质层面的西方化并不难,这方面该变的都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很大提升。只是正像慈禧太后所自信的那样,在她统治的这几十年中,大清王朝不该变的都坚守未变,比如满洲人的统治地位并没有因汉族人能力的激活而丧失和衰落,满洲贵族在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依然是主导的和最后的决定力量,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坚不可摧,维持不变。可惜的是,慈禧太后的成就与自信恰恰成为少年天子面对的最大难题,跛脚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东邻日本的比对下,更显得大清王朝旧有体制具有非常多的问题。大清王朝的政治发展受阻于一个瓶颈,急需获得根本突破。

东邻日本转身向西

作为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但两个国家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回应模式,结果只是用了短短几十年,中日两国不仅拉开一个很大的差距,而且形成严重的利害冲突。

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在西方文明来到东亚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千百年来,日本人虔诚地向中国学习,将中国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